

旁观者说

世相辣评

安立志

作弊

冯磊

时下正值考试季。有考试，就有作弊。作弊的方式有很多，比如，就有人在女孩子的丝袜上打主意。网上有图片为证，说身材修长的美丽女子在考场上作弊，方法是把小抄卷到丝袜里。监考的老师如果是男性，往往投鼠忌器。有生活经验的男人都知道，女人有时候羞不起。这个“有时候”，指的是当对方可能会指斥你“耍流氓”而实际上是她在“流氓耍”的时候。一个妙龄女孩子，为了考试，拼上了自己修长的双腿。这种人，心比黄蜂的尾巴都狠。遇到这种事情，男老师或者会旁敲侧击，或者会摇头走开了。

作弊的方式很多，其中最有效的，大约是摆平主考。无论古今，只要摆平主考，提前知道试题，那考试就容易多了。

周作人在《知堂回忆录》里提到，他的祖父周福清因为乡试作弊的缘故，几乎被砍头——光绪十三年，浙江乡试，主考官是殷如璋。殷与周早年同时考中进士，是老朋友。有了这层关系，周福清就考虑如何为孩子以及亲戚的孩子走走门子、通关节，于是，他让仆人拿了一万两银子的银票去找殷如璋。

当时殷正与其他考官在客厅里谈话，看到周家的仆人，心里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殷如璋便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把信放到了桌子上，继续聊天。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是，周家的仆人是二百五。这个没见过识的下人在门外等了很久，最后不耐烦了，他大声嚷嚷道：“此乃关银钱的大事，怎能不写个收条呢？”当着这么多人，殷如璋恼羞成怒，于是当众拆开信件。事情的结局是：鲁迅的祖父被关进大牢，判了斩监候。至此，周家开始败落。

古代科考，弊案层出不穷。顺治十四年，顺天府乡试。主考官、副主考等人勾结权贵，收受贿赂，竟公然在考场内互相翻阅试卷，照着事先拟定好的名单决定录取与否。发榜后，大批考生集体到文庙的孔孟塑像前哭吊。事情闹大了，顺治勃然大怒，在查实以后，将七名考官处斩，他们的家产悉数抄没，妻子流徙尚阳堡。

封建社会的科举考试和今天的高考区别较大。唐人笔记中记载，有人参加科举考试，从黑发考到白发，两鬓苍苍仍不死心。其中有一位，流落长安参加考试二十多年，因为屡屡落榜，没脸回家。到他中进士的那一年，家人得到的消息是他已经死了，于是，一家人在老妻的带领下哭哭啼啼到长安寻找他的尸骨。在路上，却意外地遇到了金榜题名后到外地任职的他，一瞬间，悲喜交集。

科考考试也罢，今天的高考也罢，都牵涉到个人的前途与家庭的命运。所以，在如何保证考试公正这件事上，都费尽心机。其中，最残酷的手段莫过于严刑峻法，从主考开始杀起，试图通过流血来保证考试的纯洁。尽管效果或许并不如想象的好，但，也确实树立了一种共识：考场的安全马虎不得。

随着科技的进步，作弊的方式层出不穷。2000年前后有媒体转载消息称，台湾高考，有学生戴无线耳机进入考场。当时觉得稀奇，但一年后内地的媒体上就有了类似的新闻。相信，随着技术的进步，作弊的手段还会越来越多，反作弊的手段也同样越来越高超。考场内外的屏蔽仪器、各种电子侦察手段，都在上演着猫与老鼠的传统叙事。道高一尺还是魔高一丈？每一年的高考都让人产生读破小说的刺激感受。

1953年，著名杂文家严秀先生写过一篇杂文——《论“数蚊子”》，文中对机关下发公文通过“数蚊子”考核工作业绩的官僚主义进行了尖锐批评。近日出差几天，回来后翻阅积压的报纸，竟然在5月24日的《参考消息》上看到一则“限苍蝇”的报道。

报道称，《北京市主要行业公厕管理服务标准》作出规定，“要确保每间公厕中的苍蝇数量不超过两只。”“数蚊子”的故事过去了将近60年，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又出台了“限苍蝇”的措施，也算是与时俱进了。

浏览几天前各界对此事的反映，可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有的谈及“苍蝇编制”。网友们调侃道：“北京的苍蝇愤怒了！请问：‘凭什么南昌公厕的苍蝇可以有三个编制，我们北京就两个？’南昌苍蝇瞥了一眼：‘谁让你们北京的户口那么贵啊！’海南苍蝇听后哭了：‘我们那里房地产太贵，所以是零编制，连名额都没有啊！’”有的提议，

不仅要限制苍蝇数量，更要限制苍蝇性别，只有这样才能让苍蝇断子绝孙。因此，“这两只苍蝇不能为一公一母。计划生育委员会应该搬入公厕办公。”相比之下，“南京的苍蝇是中国最具幸福感的苍蝇”，因为南京给了苍蝇5个编制。

有的提议设立“苍蝇禁飞区”。“厕所先生”是指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创始人杰克·西姆，他因致力于全球厕所卫生而赢得了这个“昵称”。两只苍蝇并非什么高标准，西姆先生建议道，“一只苍蝇都没有”才是干净厕所的唯一标准。似乎北京两只苍蝇的标准与“苍蝇禁飞区”的要求还有距离。网友报道：“受北京公厕苍蝇限养两只的影响，北京苍蝇纷纷离开北京，赶赴津、冀、豫、鲁、东北以及农村的广阔天地去发展。”更有网友突发奇想：“苍蝇王国发布紧急命令，采取战略性转移，放弃厕所大本营，除两只在厕所留守外，化整为零，转移到餐厅、酒店、超市、肉铺、菜市场等场所。”

论“限苍蝇”

媒体与网友的讽刺、挖苦、玩笑，让人忍俊不禁，却不由得想起关于官场现状的严肃课题。官场弊端，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秽政，如贪贿财色之类；二是乱政，如蛮干强拆之类；三是惰政，如尸位素餐之类。种种迹象表明，北京市出台的这项标准显得极其不周延、不严谨，可谓尸位素餐之典型。比如说，标准只强调了公厕苍蝇不超过两只，却并未明确是活苍蝇还是死苍蝇；又比如，如果本公厕苍蝇恰好两只，对它们如何对待却无规定，是与它们和谐相处还是对它们置之不理？再比如，如果公厕管理方声称，本公厕“原住蝇”只有两只，其余均为“到此一游”的“外来蝇口”，又当如何鉴定？还比如，标准只限定苍蝇不得超过两只，那么，苍蝇的子孙算不算苍蝇？苍蝇的幼虫如何清点与计算？苍蝇配额已定，配套措施若何，是否也要领导带头、齐抓共管，是否也要严格验收、奖惩兑现？至于灭蝇经费如何保证，更是不着一字。

严秀先生当年批评“数蚊子”事

生活直击

肖复兴

十字街口的父亲

星期天的上午，在美国普林斯顿的纳索街和华盛顿街交叉的十字路口，红灯亮着，斑马线前的便道上，站满了行人。因为街的对面就是个教堂，要到教堂去过礼拜的人很多。平日里清静的普林斯顿，一下子熙熙攘攘热闹了起来。

看到街对面的红灯变成了一个白色行走的小人时，人们正要过马路，忽然看见一排自行车拐到了斑马线上，几乎所有的人都停住了脚步，转头看着这一排自行车。说是一排，就是四辆，是一位父亲带着三个孩子骑车过马路，因为是三个孩子，父亲为了安全，要带着孩子们走斑马线。

看那三个孩子，大的是个男孩，有十一二岁的样子，另外两个是女孩，各有八九岁和五六岁。父亲骑着一辆黑色的自行车，哥哥骑着一辆蓝色的自行车，姐姐的车是银灰色，小妹妹的车是红色的，三个孩子又分别戴着蓝色、绿色和玫瑰红色的头盔，一列排开，花朵般盛开，煞是鲜艳。俊朗的父亲带着三个漂亮可爱的孩子，一幅天伦之乐的画面，很是惹人怜爱，难怪那么多人把目光聚焦在他们身上。温柔地洒在他们的身上。

就在他们骑车要过马路的时候，我看见骑在最后面的小妹妹，一时没有将自行车蹬起来。她的个子小，却和姐姐骑一样大小的车，显然和自行

车不大成比例，屁股没有坐上车座，脚蹬不起车蹬子，车摇摇晃晃，她很着急。父亲叫哥哥姐姐停下来，自己回转身把小妹妹扶上车座，又把车把扶正，一起向前骑去。由于耽搁了时间，当他们快要骑到十字路口中间的时候，指示灯变成红色了。一辆已经拐过弯来的小轿车停了下来，等候他们迎面而去，而紧接着有一辆黑人驾驶的白色越野车，车速过快，拐过弯来没有想到前面的车突然停住，只好来了个急刹车，响亮的刹车声有些刺耳，车头和前面车的车尾只差几厘米，却有惊无险地戛然而止。

所有这一切，司机没有任何的抱怨，只看见两位司机探出头向这一列过马路的自行车微笑着招招手。或许，这只是这个星期天上午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十字路口，总要发生一些故事的。对于我，却感到几分新奇，新奇的不在于司机的礼让和路人的友善，更在于一个父亲敢于带着三个大小不一的孩子，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骑自行车。这在北京或在国内任何一座城市里，是绝对看不到的情景。莫要说独生子女的时代已经很难看到拥有三个孩子的父亲了，即使真的能够看到拥有三个孩子的父亲，也很难看到有这样勇敢的父亲。我们的马路可以越修越宽，但越来越多的汽车，越来越难

以建立起来的汽车文明，让很多汽车成为身份的证明，可以横冲直撞，可以肆无忌惮地抢红灯，和行人争路，让在十字路口等候过马路的大人都心惊胆战，谁还敢带着三个孩子骑着自行车横穿十字路口？

当然，也不能完全怪罪汽车司机，我们的父亲，缺乏了这位美国父亲的勇敢，其实是更缺乏这样的责任心。我们的父亲，更愿意自己开车带着孩子去兜风，即使自己不开车，也要坐一辆出租车去游玩。我们的孩子的自行车，一般是放在家里或幼儿园里，成了玩具或是锻炼身体器械，而不再是交通工具。因此，在北京，我会看到孩子和狗一起坐在小汽车里将头探出车窗或天窗，然后看见汽车一溜烟儿飞驰而去，却看不到这样一位父亲带着三个孩子穿行在车水马龙的马路上而所有人都会保护他们的温馨情景。

就在我站在十字路口走神的时候，那父亲带着三个孩子已经穿过马路，拐到街的另一侧，飞快地骑走了。我看到那个小妹妹撅着小屁股，蹬着小腿骑车紧紧追赶她的哥哥和姐姐的样子，看见父亲骑在最后面像老鹰展开羽翼守护着他的鹰雏的样子，如一条彩虹在荡漾。

这时候，街对面的教堂正响起了晨祷悠扬的钟声。

沉思默想

戴永夏

从“人不狗”看道德失衡

指人为“狗”或说“人不狗”，通常是对人的污辱，谁都不愿接受。然而，对于某些人来说，其所作所为，真的连狗都不如。笔者之所以发此感慨，盖因看了两则报道。

近日某报上登载了两则反差很大的新闻。其一说的是广东中山市的阿坤，坐拥几千万家产却不赡养老人。当其父到医院看病需车接送时，他拒绝出车。然而当看到父亲租别人的车每次付费100元时，他又主动上门“争买卖”，送父亲一趟照收100元车费……其二说的是四川自贡市王女士家养的一只小狗，当王女士的母亲在世时，这只小狗与老人相依为命，以其忠诚、温驯、体贴给老人带来莫大的安慰和快乐。今年3月老人因病去世，这只小狗一直眼泪汪汪地守在老人床边，不吃不喝，绝食16天后也随老人而去……

应该说，以上事例并非个别。当今社会，不孝敬老人以至虐待老人的现象，各地并不鲜见；而义犬忠于职守，以身护主、救主的事也时有发

生。两相比较，美丑分明。说不孝之人不如狗，于事于理，都不算过分。

那么，为何受过教育(尽管受教育的程度不同)、比狗“文明”的现代人，其行为反不如未受教育、处于野蛮状态的狗呢？这还应从老祖宗那里说起。作为由动物进化而来的人类，本来是具有一些跟其它动物相同的原始美德的，比如敬老爱幼、忠诚守信等，这都是人的底线道德的基础构件。但随着人类的进化，这些原始美德却在有些人身上退化、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等恶劣劣性。而一些未曾进化的动物如狗、马、牛等，反倒将这些美德保留了下来。反映到现实生活中，人与动物便会产生巨大的行为反差，从而出现“人不狗”这样怪异的社会现象。

“人不狗”现象的存在，是对现代文明的莫大讽刺，它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我们道德教育的相对滞后和教育方式的偏颇失当。

应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和政府是比较重视道德教育的。学雷锋，创“三好”、“五讲四美”、“八荣八耻”……这些行之有效的教育活动，对提高国民的道德素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然而不可否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道德教育存在口号化、形式化、脱离实际、盲目浮夸等毛病，道德目标定得高不可攀，却把一些最基本的底线道德弃如敝屣。比如，我们曾大力提倡“公而忘私”、“忘我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道德精神，却忽视了对年轻人进行孝敬老人、诚实守信、仁慈友爱等最基本的道德教育，甚至将一些传统美德当成封建糟粕进行批判。这样一来，一些人连最基本的道德修养都没有，又哪里谈得上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因此出现道德滑坡，一些丑恶社会现象泛滥成灾，也就不足为怪了。正如一位作家所言：“若干年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绝对道德高标，使当代中国人的道德

水准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最彻底的滑坡，几乎滑到了中华民族最近两千年历史的最低道德低谷……”(张远山：《过高的道德标准导致道德的滑坡》)更有甚者，一些贪官还把高标道德当做违法乱纪的挡箭牌，台上高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背地里却连不贪不沾的基本道德都不讲，大肆贪污盗窃、索贿受贿……这一切，都进一步说明一些高标道德的不切实际和加强底线道德教育的重要意义。

当然，笔者这样说，并不是反对高标道德，更不是否定“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伟大精神，只想对德育教育的决策者们进一言：高标道德是不能凭空建立的，它必须建立在底线道德的基础之上。要培养具有共产主义道德的新人，必须下大力气从底线道德抓起，否则将事与愿违。这正如盖楼一样，基础打不牢，再华美的大厦也建不起来，勉强建了起来，最终也会坍塌！

